

· 文学史研究丛书 ·

汉魏六朝文学新论

—— 拟代与赠答篇

梅家玲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· 文学史研究丛书 ·

汉魏六朝文学新论

——拟代与赠答篇

梅家玲 著



 清华大学出版社
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

SBI 94 1-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魏六朝文学新论·拟代与赠答篇/梅家玲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4. 11

(文学史研究丛书)

ISBN 7-301-08110-3

I. 汉… II. 梅… III. 古典文学-文学研究-中国-汉代-魏晋南北朝时代 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9750 号

书 名: 汉魏六朝文学新论——拟代与赠答篇

著作责任者: 梅家玲 著

责任编辑: 艾 英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8110-3/I·0701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

排 版 者: 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890mm × 1240mm A5 8.75 印张 225 千字

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0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“文学史研究丛书”总序

陈平原

中国学界之选择“文学史”而不是“文苑传”或“诗文评”，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，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。从文学观念的转变、文类位置的偏移，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，“文学史”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。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，“文学史”在 20 世纪的中国，产量之高，传播之广，蔚为奇观。

从晚清学制改革到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展开，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，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。在此过程中，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：林传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（1904）还只是首开记录，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，如姚永朴的《文学研究法》、刘师培的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和《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》、黄侃的《文心雕龙札记》、吴梅的《词余讲义》（后改为《曲学通论》）、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胡适的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》和《白话文学史》、周作人的《欧洲文学史》和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，以及俞平伯的《红楼梦辨》、游国恩的《楚辞概论》等。这些著作，思路不一，体式各异，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。

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，并无“惟我独尊”的妄想，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；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，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。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，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，北大

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,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。

在很长时间里,人们习惯于将“文学史研究”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(或教材式的“文学通史”),其实,“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”,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,尽可不必画地为牢。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,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,也都各具面目,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。

那是一个“开天辟地”的时代,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,但生气淋漓,至今令人神往。鲁迅撰《〈中国小说史略〉序言》,劈头就是:“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”;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:“有之,自鲁迅先生始。”当初的处女地,如今已“人满为患”,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?胡适撰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,以历史眼光、系统整理、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,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。今日中国学界,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,早就超越胡适的“三原则”,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?

当初鲁迅、胡适等新文化人“整理国故”时之所以慷慨激昂,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。今日中国,能否有此迹象,不敢过于自信,但“新世纪”的诱惑依然存在。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,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。

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,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,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。在20世纪中国,相对于传统文论,“文学史”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。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,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,如何洗心革面、奋发有为,值得认真反省。

反省之后呢?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——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。

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

生命的行迹

——新版自序

许多学术研究，似乎都是来自于自我生命中的日常生活体验。而和这本书有关的，大概是练字与写信吧。

记得小时候学书法，一开始被要求的，就是描红临帖。虽然一本柳公权的“玄秘塔”，前后临了不下千百遍，写来仍然是四不像，但那从无到有，从力求与前人形似，之后终究还是得以自我挥洒的过程，却是儿时一段难忘的回忆。那时候，总不免会好奇：为什么一定要照着帖子依样画葫芦？为什么不能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？另外，如果说“字如其人”，那么，是不是学久了欧阳洵，性格就较硬挺，练多了赵孟頫，就较柔婉呢？

还有写信。自从初通文墨，开始和朋友、亲人间有书信往来的经验之后，最强烈的感触，就是“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”——也就是，因随关系亲疏的差异，背景及认知基础的出入，即或同一件事情，同一种心情，在面对不同的书写对象时，都会有不同的表述方式。当时只觉得有趣：怎么自己好像具有多重人格？浮游交错在那么多的剖白之中，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“自我”？

这些疑惑，当时并未得到解答，也不觉得需要解答，但前些年大量阅读魏晋诗赋，却仿佛隐隐然触类旁通，获得了某种启发。

话说 1991 年夏天，我刚完成博士论文《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》，并顺利改聘为台大中文系的副教授，因缘际会，受命担任系

内“诗选及习作”必修课程的教学工作。然而心中忐忑,实难以言喻。原因无它,因为我硕士论文做的是明代文论,即使博士论文改弦易辙,上探魏晋,所关注者,仍偏重在语言美学与小说叙事等议题之上。虽说长久以来,便深深着迷于唐诗宋词的优美意境,但业余欣赏,毕竟不同于专业的研究与教学,如今,既要面对学生,焉能不加紧自我充实?

正是如此,我开始大量阅读汉晋诗歌,兼及赋作,同时也留意学者们的相关研究。在这过程中,最先注意到的现象,就是这一时期的诗歌,实以“拟作代言”与“赠答”为最大宗,但可怪的是,此前竟然没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——为什么呢?是不是因为“模拟代言”一事意味着保守因袭,“赠答往来”隶属交际应酬,放在言志缘情的书写传统之中,层次不高?然而,事实上,即或如陆机、陶潜、谢灵运等名家,拟代赠答之作,也所在多有,这又该如何解释?再说,魏晋人强调“情之所钟,正在我辈”,讲求“我与我周旋久,宁作我”,着重在言谈文词上力求新变,又怎会甘心平白以因袭、应酬的态度去为诗作赋?

这时候,过去习字与写信的经验,不期然地成为一种类比的参照坐标。它们不见得能与“拟代文学”及“赠答诗”的写作完全相提并论,却促使我认真思索文学艺术与个人生命体验间的关联,以及所关涉的种种问题。正是如此,生命体验的传承与转化、文学艺术活动中的模习与创新、人际往还中的“人/我”互动与自我形塑,以及它们彼此间的辩证对话,遂成为我研究时的重要切入面向;而汉魏六朝“拟代文学”及“赠答诗”的研究,似乎也就在这些面向的交错观照下,逐渐有了不同既往的成果。

这一系列论文的酝酿与撰写,集中于1993年到1995年之间,如今想来,每篇文章背后,都有不同的因缘纪事。依时序,《汉晋诗赋中的拟作、代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——从谢灵运〈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〉的美学特质谈起》1995年春在《台大中文学报》刊出,发表最早。它是全书论述所以开展的重要基础,也是从

构思到完稿历程最为漫长艰辛的一篇。为了突破前人对于“拟作”、“代言”文学的成说定论,我试图在全面爬梳原始资料的同时,另参酌西方文学美学中若干阅读/创作理论,以深化论述;于是花了相当时间,努力消化吸收许多理论性著作,个中甘苦,自是点滴心头。然而,一旦完成,却有如武侠小说中所谓的“打通任督二脉”,此后写作,便也倒吃甘蔗,渐入佳境。在写作及修改期间,素来敬爱的廖蔚卿与彭毅两位老师,以及本系柯庆明、郑毓瑜先生,为我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,使我获益良多,在此要特别向他们致谢。

《汉晋诗歌中“思妇文本”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》初稿发表于1995年底东海大学所主办的第一届“妇女文学学术会议”。撰写期间,适逢女性主义思潮在台湾方兴未艾。由于当时引进鼓吹者,多为外文系学者,所据以论析的文本,自然偏于英美文学,即或有本土性论述,也多集中于现当代,至于古典文学的女性研究,实有待开发。因此,如何将当代女性主义观点融会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,以期彼此映照、相互深化,遂成为我当时的关怀焦点。所幸,初步的尝试还算颇受肯定,会议之后,修订稿随即刊登于《台大文史哲学报》,并被收录于加州大学吴燕娜教授所选编的《中国妇女文学论集》。另外,据此改写的《谁在思念谁?——徐淑、鲍令暉思妇诗与汉魏六朝“思妇文本”的纠结》一文,也被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选入《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》一书。这篇文章,为我此后的女性/性别研究开启端绪,在个人学术生涯中,具有一定意义。

不过,全书最值得一提的,还是《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》。它的初稿早在1993年夏天便已完成,算是本系列论文最早成篇者。然而修订之后正式发表,则是在1995年秋南京大学所主办的“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上。那是我第一次赴中国大陆参加学术会议,与会地点,又是昔日六朝古都金陵,感受自然别有不同。还记得,大会由周勋初与张伯伟先生主

持,除了开幕当天有程千帆先生专题演讲外,北京大学袁行霈、张少康,山东大学张可礼等前辈,南京大学许结、张宏生、曹虹,上海师大曹旭,社科院刘跃进等青壮辈学者,以及台湾六朝研究的专家洪顺隆、杨承祖、蔡宗阳、李立信教授等,也都与会发表论文。三天会议中,大家以文会友,会后并且一同前往考察南齐帝王陵墓遗址,往事历历,在在令人难忘。正是这次会议,使我结识了不少优秀的大陆学者,并成为时相往还的好友。南京天高气爽的秋日风情,会中论学析理的纵横意气,也因此为个人的生命历程,图绘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至于《二陆赠答诗中的自我、社会与文学传统》,既是本研究系列的收尾之作,也是当年获得“国科会”专题研究计画奖助的成果报告。而我当初所以申请“专题研究计画”,实出于系内同事兼学长古清美教授的鼓励。古先生在明代思想及佛学方面的研究十分杰出,为人仁慈宽厚,对我的研究向来多所关照鼓励。可惜天不假年,抗癌多年后,仍不幸于去年夏天辞世,令人追怀不已。何况,在此之前,当年曾出席南京文会的程千帆与洪顺隆先生,更早已先后作古。当此重理旧作之际,心头闪现的,遂不免是谢灵运《拟邺中集序》中的文句:“撰文怀人,感往增怆。”而本书此时再次结集出版,于是也就因为岁月推移,于原书的学术论述之外,另增添了几许人世的憾怅。如果说,汉魏六朝“拟代文学”及“赠答诗”的写作,是时人所留下的种种“生命的行迹”;那么,对它们的研究历程,及其所牵涉的个人生命体验,又何尝不然?天地逆旅,浮生若寄,不同时空中的行迹纵使杂沓多方,但藉由书写铭刻,总也要为人文世界,留下动人的传承。

以上四篇文章,连同《序言:新视域的拓展——兼谈“拟代”与“赠答”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的意义》,曾以《汉魏六朝新论:拟代与赠答篇》为题,于1997年由台湾里仁书局结集出版,引起学界不少关注;随即并有若干青年朋友各自据以引申扩展,发展为学位论文。汉魏六朝“拟代文学”与“赠答诗”的相关研究,似乎也在长

久冷寂之后,开始有了多元而活泼的气象,这毋宁是令人欣喜的。新增收的附录《毛诗序“风教说”探析——兼论其与六朝文学批评之关系》一文,原是就读研究所博士班期间,修习裴溥言先生“诗经学”课程的学期报告,1990年发表于《台大中文学报》。虽是学生时代的习作,但自认还有些新意,因此野人献曝,附志于此,也算是作为研究生涯开始之初的纪念吧。

当然,本书能被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“文学史研究丛书”,与国内学界见面,实由于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及出版社张凤珠女士的促成,在此也要对他们深致谢忱。

梅家玲

2004年春于北京圆明园花园别墅

序言：新视域的拓展

——兼谈“拟代”与“赠答”在汉魏六朝 文学史上的意义

本书的主旨，在于以汉魏六朝文学中的“拟代”与“赠答”两类文学为基本素材，尝试提出若干新观念，以期为该时期的文学研究拓展新的观照视域。

汉魏六朝乃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期。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中，历来备受重视。不过，尽管既有的研究成果已多有可观，但随着学术界新观念、新方法不断被引进运用，非但许多看似已早有定论的成说，实有被重新定义、诠释的必要；在既有的研究之外，也仍然有不少其他的视域，值得进一步开拓。本书所处理的“拟代”与“赠答”两类文学，便是颇值得注意的研究面向。其中，“拟代”部分，试图为素被误解的拟作、代言现象，在文学史上重新定位；“赠答”部分，则在尚且乏人关注的研究现况中开疆辟土，标识出另一个值得探究的新领域。而经由它们的彼此映照互证，正所以开显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新貌。

所谓“拟代”，是指以“拟作”、“代言”方式所完成的诗赋作品；“赠答”，其实也就是“赠答诗”，乃系文人之间藉以交通往还的诗作。所以选择它们为研究起点，实因自汉魏以来，这两类文学便一直是当时文人创作的大宗。即以萧统编选的《昭明文选》为例，该书将诗分隶二十三门，其“赠答”一门，收王粲以下至齐梁的诗作凡七十二首，为数之夥，几甲于全编，所受重视的程度，于此可见一斑；“杂拟”一门，辑录陆士衡、张孟阳、陶渊明、谢灵运等人的

拟古诗作凡六十三首,亦极可观。而西汉“贤人失志之赋”杂然纷陈,以及诸多以“七”、“九”名篇的辞赋变代迭出的情形,更见证了“拟代文学”在彼时发展的盛况。

然而,尽管“拟代”与“赠答”之作在汉魏六朝盛极一时,并且也受到当时论者(如萧统、钟嵘等)高度的肯定,但后世学者却似乎并未注意及此。其原因大抵不外乎:或将“拟作”视为“伪作”的类同物,以为它“不真”,“与创作者自我生命无关”^①;或以为“赠答”不过是为交际应酬而作,既缺乏真性情,也不具艺术价值,相对于《古诗十九首》以来止于“自言其情”的作法而言,乃是一种异变^②。

但问题是:这两类作品在汉魏六朝大量涌现,绝对是不容否认的事实,甚至于,正是经由它们,才形塑出彼时特殊的文学风貌。因此,与其主观地贬抑、漠视它们的存在,不如调整观照角度,客观审慎地探问:为什么当时的文人要写这样的作品?它们出现的意义为何?是否反映了某些特定的生命情态与社会现况?在文学传统中,这些作品将如何定位?

基于此,在检视当时的相关作品后,我发现:谢灵运的《拟魏太子〈邺中集诗〉八首并序》,是一个很适合的研究开端。一则,它是谢客对建安诗作的“拟代”,若能针对它的美感结构和写作时的相关美学活动予以深究,并配合对汉晋以来拟作、代言现象的考察,当有助于对该类文学成因、流变与特色的厘清;再则,谢客所拟代的对象,又恰好是建安诗歌中的“赠答”、“公燕”之作,沿波讨

① 如王瑶《拟古与作伪》一文中即曾指出后人往往将“拟古”与“作伪”二事相提并论,并多方考辨驳斥。说见《中古文人生活》,收入《中古文学史论》(台北:长安出版社,1982),页110—134。龚鹏程也指出拟作“不真”、“与自我的生命无关”,见《文学散步》(台北:汉光文化事业公司,1985),页176。

② 持此类观点者或可以叶燮为代表,叶氏以为:“《十九首》止自言其情,建安、黄初之诗,乃有献酬、纪行、颂德诸体,遂开后世应酬等类,……此变之始也。”说见《原诗》(内篇上),引自《曹操曹丕曹植资料汇编》(台北:木铎出版社,1981),页275。

源,亦可为“赠答诗”的相关研究启迪端绪。

以是,在以下的论述中,本书将先由《汉晋诗赋中的拟作、代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——从谢灵运〈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〉的美学特质谈起》一文起始^①,先深究灵运拟作的“美学特质”,进而带出对普遍风行的汉晋诗赋中之拟代现象的考察和省思。文中指出:

在谢作的美感结构方面,其以“诗”、“序”毗连并列、错综为文,为作品创造出极其特殊的“空间形式”,不唯体现出一圆融完整的美感结构,并为读者的阅读,提供了与一般“线性式”阅读迥异的,着重瞬间“回映式”领悟的美感经验,于艺术表现方面,实有过人之处。以此一作品为例,亦可见拟代作品的完成,实关涉一“从读者到作者”的美学活动,它包括对阅读活动的“具体化”、创作活动中的“神入”和“赋形”,以及从读者到作者——“即境即真”的“创造性转化”等。由此可见,从创作到完成,拟代作者的心中,一直不断进行着无数复杂的互动和转化,而在连串的辩证性交融中,每一刻体验的瞬间,都因有现时经验的即时融入与拣择,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与创造性,并以此成就、丰富了自我的生命经验。

以此为据,复考诸汉晋以来的拟作、代言现象,则可知:绝大多数作品的完成,乃是出于一分不能自己的、欲对“人同有之情”相参互证的情怀。因而,汉晋以来拟代体的写作,实系时人重温过去,参与现时,迎向未来的一种生命体验;并且在此一深具“创造性转化”的生命体验中,完成其在文学传统中的积极意义。

不过,正由于“以生命印证生命”乃是“拟代”写作的重要前提,而在“创造性”的“转化”中,“印证”其实涉及心理上复杂的“认同”过程。于是,接下来的问题便是:此一“认同”如何形成?蕴塑其形成的社会/文学背景如何?若换一角度来看,此类认同又是否会影响(或伤害)其认同对象的主体性?

^① 该文曾发表于《台大中文学报》第7期,1995年4月。

相思情怨是魏晋诗歌中的普遍主题,尤其自曹植《七哀诗》以来,“思妇”即成为文人拟代的重要对象,因此,无论是“思妇文本”本身的形成衍变过程,抑或其与拟代文学间的缪轶,都是彼时文学史上值得关注的课题。而《汉晋诗歌中“思妇文本”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》^①,便一方面耙梳“思妇文本”的形成过程,另一方面,也就其相关问题,予以厘析。

经由这一部分论述,可以看到:建安以前,来自民间歌诗中的“思妇”情怀流衍放恣、活泼多元;建安暨建安以后,则因文人大量以“拟作”、“代言”方式有意为诗,遂使“思妇”成为一具有“典律”性格的美学典型。其间,传统社会之婚姻观与性别规范固有其影响力,但结合了政教理想与比兴谏诤手法的“诗言志”观念,及盛行于当时的拟代风气,更是促兴此一文本的重要因素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由于它多出自男性文人之手,故在不断进行的“性别仿拟”之中,为原本或仅为虚拟想像中之理想形象的“思妇”,建构出特定且僵固的“性别身分”,并反过来支配、规范了真正妇女的言行表现,进而促成女性主体的消解。相对于“拟代文学”的正面意义——为时人提供重温过去、参与现时、迎向未来的生命体验——此一由“思妇文本”所牵引出的女性/文学主体性被虚拟、篡夺的问题,实不啻为“拟代文学”的研究,提供另一角度的省思与对话空间。二文合并以观,适可见出“拟代”在汉魏六朝发展时所涉及的不同面向。

至于“赠答诗”,则分由《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》^②和《二陆赠答诗中的自我、社会与文学传统》两篇文章予以处理。前者系以赠答诗形成发展过程中,最具关键性的建安赠答

① 该文曾发表于《台大文史哲学报》第44期,1996年6月。

② 该文曾宣读于由南京大学所主办之“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”,1995年11月。后收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编《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》(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7),页196—247。

诗为研探中心，一方面上溯先秦，为“以诗赠答”之风的由来及发展经过梳理脉络；另一方面，则配合时代因素，论析其时之士人群体特色、诗歌类型，及其在整个“赠答传统”中的“示范意义”。

此一论述指出：无论是文学方面，抑或社会方面，在整个“赠答传统”中，建安赠答诗都有其承先启后的示范性意义。文学方面，除提供一人际往还沟通的美学形式外，更突破政教、社会性的既有限制，开创出无物不可写、无情不可抒、无事不可叙的新体貌；社会方面，则因赠答诗系“精英团体”、“仪式行为”与“象征符号”的展现，故于圣贤、将守之外，使“文士阶层”成为另一“精英团体”，彼此间以诗作赠答往返，亦以此而成为具有“仪式行为”之特质的“象征符号”。它的出现，更为魏晋以后文人每以“集团”形态举行大规模的游宴，及频以诗作相互酬赠的作为导其先路。

不过，由于现今可见之建安赠答诗多属“赠诗”，“答诗”不多，其因赠、答往还而生之美感趣味及人我互动情形，亦未能充分得见，而“二陆”的赠答诗，便成为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时的切入点。

二陆的赠答之作，不仅在数量上居于魏晋诗人之冠，且在内容上，既有兄弟至亲间的相互赠答，也有与当时权贵间的酬赠，更有为人代作赠答之属；其诗作之内涵、体制，本多有变化，由诗作所形塑出之自我形象、社会面貌，及其与文学传统间的多重互动关系，非但多有可观，值得深究，更可成为管窥魏晋赠答诗一般特色的起点。因此，在《二陆赠答诗中的自我、社会与文学传统》一文中，首先着眼的，便是赠答诗的双重性格：“仪式性”与“美学性”。循此，乃可见出自我/社会/文学传统在赠答诗中的建构与汇融情形。据以探析二陆之作，可知：原来看似单纯的赠答活动，实则在“仪式行为”、“精英团体”等社会学意义之外，另有“召唤在场”、“应对想像”、“交换原则”等美学特质，每一首“赠答诗”，其实都是各种不同社会/文学要求的辐辏点；因而，与不同对象进行目的及质性互异的赠答往返，乃是“自我”于多重关系网络间依违游移的辩证历程，不同时代的赠答作品，自然也就形绘了“社会”时

风的不同面向。

经由上述各论点的相互映照,亦可发现:“拟代”与“赠答”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的出现,绝非偶然。由于汉魏继周秦之后,彼时《诗》、《骚》等经典性文本典范俱存,各种文学体类犹待滋衍,“文士”的社会阶层,则仍在酝酿之中。此时,着眼于“以生命印证生命”的“拟代文学”所以应运而起,实因它适时地提供一具有“近似的再演”质性的文学/生命形式,使文人既得以借鉴前人的生命经验,为一己的存在定位,也能在既有文本的影响下,更缔新猷,体现融“曾经”与“现时”为一,寓“传统”于“创新”之中的,深具辩证性的传承意义。其肇兴于汉世,绵延不绝于魏晋,所见证的,正是在一个“文的自觉”与“人的自觉”逐步酝酿滋萌的时代中^①,文人如何藉由出入古今、折冲新旧,以图建树一己之主体性的努力。

然而,随着“文学”观念的日趋成熟,以及“文士”阶层在建安时期正式成形,诗文创作,除为个人吟咏情性之具外,同时并负载了“社交”的功能;甚至于,还成为区隔文人团体与其他社群的重要标记。在此情况下,“赠答诗”于建安之后成为文人创作的大宗,所反映出的,便不仅是为诗者个别的情志款曲,也是个人自我与社会群体,乃至文学传统的互动实况;不仅是“礼尚往来”的社会需要,也是身为文人者的一种存在姿态。它的正式成形并蔚然成风,便也不仅为文学/文人自觉作出正面宣示,更幽微地吞吐着个人与群体、文学与社会政治间若即若离的张力。

也因此,若将“拟代”与“赠答”合并以观,适可见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两大重要面向:纵向的承先启后(拟代),与横向的往来互动(赠答)。前者,铭记着人文世界相继相承的行进轨迹;后者,则图写了当代瞬间的个体存在情境,和与之盘结互动的多重关系网络。而该时期的文学风貌,也就在它们的形成、发展与交

^① “文的自觉”与“人的自觉”之说,参见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(台北:元山书局),页85—101。

互影响之中，逐一呈显。它们的出现，在文学史上当有一定意义。本书的论述，容或尚有未尽之处，但却不妨视为一个研究的起点，也希望经由此一新视域的开拓，为汉魏六朝文学的相关研究，提供参考。